目　录

最是橙黄桔绿时…… 曾祥祜 （1）

记郭敬宇先生二、三事…… 黄鹏南 （8）

旧德阳地方势力概述……王朝华 曾南生 （14）

一九二六年德阳县“抗粮事件”内幕…… 王朝华 （22）

记一九四四年黄许蔗农们的斗争……丁文卿 张辅良 （34）

记清乾隆末年罗江知县杨州鹭…… 刘仁铸 （37）

一日三换县令…… 王朝华 （40）

“保路会”在德阳的活动…… 王朝华 （4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最是橙黄桔绿时

——德阳县园艺场的创建和发展

曾　祥　祜

德阳县园艺场位于县城东门外三公里处的小山门。前临千顷平畴，后靠万壑浅丘，总面积760多亩，人民渠四十支渠纵贯全场。无论交通、水利、能源、土地资源各方面都具有较优越的条件。全场下属三个果树生产队，一个奶牛场，一个蓄电池厂，一个冰糕厂，一个机电组和一个商业门市部。全年产水果40余万斤，鲜牛奶100余万斤，总产值63万余元（其中副业产值占52%）。曾分别获得省、地农业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园艺场的前身

解放前，一个彭姓地主在旌阳乡的小山门经营了约有10亩面积的小果园。解放后土改时将其留为公地，拟建一所农校未成，由县文化馆雇了三个工人经营。1956年移交给县人民政府农业科管理。农业科派了刚从省园艺学校果蔬专业毕业的曾祥祜兼管。当时全园共有五名工人：包括原贺家花园（现党校内）的全部果树，全年可产红桔6,000多斤，柚子2,000多个，加上部分农作物的收入，全年产值1,000多元，仅能用来维持五个工人的工资和简单再生产，纯属一种

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营方式。1957年，在原基础上新扩土地10亩，从省园艺试验站引进鹅蛋广柑（即锦橙）400株定植，首次在德阳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小型良种母本园，人们习惯地称呼为德阳果园。

艰苦创业

1958年8月，为适应工业区发展的需要，德阳县委决定以果园为基础，建立一个国营园艺场，指派曾祥祜负责筹建，划了旌阳公社的玉泉、春景、马鞍三个村的部分土地共700多亩（以公田公地掉换），接收占地范围内15户社员为农业工人。10月，在宣布“公社化”时，“德阳县园艺场”亦正式宣布建立，吴承德同志任支部书记兼场长，并从黄许农场调来10名工人作为骨干。59年初，县农业基建师撤销后留下100多名民工和干部转到园艺场，由蔡应富同志任支部书记，人力物力都得到进一步充实。

建场初期，正值我们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因此，摆在全体职工面前的是一条极为艰苦的创业道路。没有办公室，挤在旧民房内办公；没有食堂，用竹席搭棚作食堂。全体职工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日夜加班，搬砖运瓦修建房舍，领导和干部带头苦干，无一例外，相继盖起了办公室和食堂。宿舍仍然利用旧民房，把主要精力和资金用于生产建设上。

建场时，除了原来的一个杂乱无章的小果园外，可以说一无所有。新划的土地小块而零星，高低不平，其中还有不少的水田，开拓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事物的发展有其本源。为此首先抓住自建苗圃这个主要环节。没有种子、就动员职工，带上工具和干粮到寿丰、新中、和兴一带挖回橘子、棠

梨的根和苗（用作嫁接梨和苹果的砧木），并收集毛桃和柑桔种子，在短期内创建了一个小型果树苗圃，为发展园艺奠定了根基。

园艺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科学技术的指导。采取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办法传授科技知识，指导园艺实践，着手培养技术队伍。全场百余工人都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村，既缺乏园艺知识，更不懂嫁接技术。经过领导动员，号召人人从头学起，由技术员手把手地教，从实践中把这批普通农业工人，逐步培养成为熟练的园艺工人。为了解决优良接穗，技术员主动奔赴简阳、江津、雅安、西昌和会理等地采集。经过两年努力，共培育出两万多株柑桔、苹果、梨、桃等良种树苗，61年到62年全部出圃定植。从此，山上山下、山前山后450多亩土地上出现了成排成行的果树，用勤劳的双手初步勾勒出一个园艺场的轮廓。其中，柑桔主要品种有锦橙、脐橙、香水橙、血橙、夏橙（供试验）、温州蜜桔、无核柚、晚白柚、沙田柏、蓬溪柚等十多种。梨的主要品种有黄蜜梨、二宫白、博多青、鸭梨、菊水、酥梨、苍溪雪梨等。苹果品种有祝光、麻皮、丹顶、金冠、国光等。桃的品种有白花桃、上海水蜜、小玉露、黄肉桃等。这些成果，是园艺工人的汗水与技术人员心血的结晶。其中，60年从内江地区农科所调来的李国志同志，68年分配来场的甘一君同志，都是大中专毕业的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在艰苦创业的道路上，为发展德阳的园艺事业，留下了他们跋涉的脚迹，做出了一定贡献。

白手兴家创业维艰。全场职工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艰苦条件下，治理山坡，开辟台地，移植果苗，精心栽培，

每天至少坚持12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而且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在“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口号鼓舞下，终于战胜了各种困难，使园艺场得以初具规模。

橙 黄 桔 绿

在建场初期的果苗繁殖过程中，科技人员发挥了聪明才智，创造了利用砧木根（主要是苹果梨桃的砧木）在室内直接嫁接的方法，使出圃时间可提前一年。在果树栽培管理上，第一次成功地防止了在川西北为害严重的柑桔虫害——瘤壁虱（即胡椒子），使60年的红桔产量比59年增产两倍。全场新栽的果树从65年开始陆续投产，66年总产达10万余斤（主要为桃）。67年锦橙第一次出口，远销香港。到80年为止，共出口锦橙 120 多吨。在十年内乱中，科技人员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忍辱负重，深入实际，与职工一道连续五年坚持了对柑桔的提纯选优工作，并参加了全省柑桔选种协作组。75年12月全省柑桔选种会议在德阳召开，参观了现场，得到了与会专家、教授、代表们一致好评。科技人员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还成功地革新了沿用卅多年的柑桔靠接换砧技术，创造了柑桔多头高接换种，苹果树树皮移植法。近几年来大面积推广了柑桔的“矮、密、早”栽培新技术，亩栽密度由原来的40株增加到166株，收到了树型矮，投产早的预期效果。由于科研与栽培紧密结合，不仅保证了果品产量逐年上升，而且促进了果品质量不断提高，深受各地群众的称道，同时自69年以后，场里接收了一部分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经过老技术人员的传、帮、带，又扩大了技术队伍，这是进一步发展园艺事业的有利因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鲜 奶 应 市

为了适应广大群众的生活需要，并为发展果树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重视了养殖业的发展。65年全场仅有奶牛30头，年产鲜奶7万多斤。经过逐年扩大繁殖，采用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先进技术，79年增加到165头，年产鲜奶60多万斤。82年总头数达220头，产鲜奶97万斤，除供应县城居民、干部、厂矿职工的鲜奶需要，还远销绵竹汉旺的401厂，为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增强群众的身体素质服了务。由于奶牛的发展，既为果树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料，还为沼气池发酵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从而促进了场内沼气建设的发展。

沼 气 节 能

从领导到全场职工认识到利用沼气，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有利生产的重大意义后，1974年在吴承德同志的带领下，在县委、县沼办的关怀和支持下，试建了一口72立方米的小型沼气池，一举获得成功。75年以后又相继建池9口，总容积为1,680立方米，同时建成一个小型沼气发电站，安装50瓩/75马力、75瓩/120马力发电机组两台，利用沼气柴油混烧，节油率达70%，年发电1.8万度左右。三个集体食堂和一个奶牛场以沼气为能源，每年可节约原煤120吨，职工食堂的饭票价格从75年5月开始每斤降为0.14元，使职工生活得到了改善，节省了开支。

由于沼气池和奶牛房有机地结合配套，充分利用高坡台地的地形，使牛房排出的粪便污水自动泻入沼气池内，发酵后的肥料又可顺着沟道自动流进果园，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

果树施肥时肩挑背磨的繁重体力劳动与投入大量人工的艰难状况，从而节约了20%的劳动力来从事工副业生产，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场总产值的52%以上，充分显示了沼气节能的综合性经济效益。

场内沼气建设的高潮期正值“四人帮”篡党夺权为害最烈的75、76两年，全场职工在吴承德同志的带领下，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劳动，日夜奋战，发扬了建场初期的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尽管当时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之风盛行，甚至有人于76年8月向“中央”投书告密，诬蔑园艺场是“修正主义重新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种种政治压力接踵而来，但大多数干部职工团结一致，顶逆流，抗干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功。1978年，园艺场的沼气建设经验，国务院以内参文件下发推广。自1978年以来，共有24批，150多人次，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场参观和考察，计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典、埃及、伊朗、印度、菲律宾、朝鲜、罗马尼亚、意大利、布隆迪、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他们当中有政府的高级官员，有专家、教授、研究生等学者，还有著名和平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及印度三十年代从事沼气研究的被誉为“沼气之父”的老人，也有的是在成都参加联合国沼气训练班结业回国后率代表团第二次来场考察的，还有美籍华人专家在国外看到资料后利用到四川之机慕名访问的。他们一致认为德阳园艺场的沼气设施配套合理，设计科学，造价低廉，经济效益显著，是一项比较完善的农业工程。不少外宾回国后有写信来表示感谢的，有函索沼气资料的，有电邀参加专业会议的。总之，对我场的沼气建设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赞赏，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

荣誉。

此外，还接待了两次全国沼气会议的代表，1975年12月15日赵紫阳总理曾亲临视察。不少省外各级领导、专业科技人员来场参观，为我国沼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具有现实性和适用性的可行的实践经验。

令人惋惜的是：1980年3月，吴承德同志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他，为德阳园艺场的开创和发展，整整艰苦奋斗了廿二个春秋，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党的事业。

前 程 似 锦

德阳县园艺场创建25年来，在县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支持下，走过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左倾错误，排除了右的干扰，四项基本原则武装了全场职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更好地贯彻了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园艺工人三结合的原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出现了“最是橙黄桔绿时”的兴旺发达景象，无论产值、产量、利润等主要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79至82年四年产值总和（209.8万元）接近59至78年20年产值的总和（212.87万元），换言之，一年相当于五年的产值。79至82年四年的利润总和为13.6万元，而59至78年20年间盈亏相抵后亏损总额即为9.04万元。两相对比，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历史功绩。我们可以预期德阳园艺场必将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为其开辟的综合经营、健康发展的金光大道，向着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阔步前进，在阳光明丽的四化的春天里更加郁郁葱葱，前程似锦，秀色满园。

记郭敬宇先生二三事

黄鹏南

郭敬宇先生名鸿銮，字敬舆，号敬宇，为郭树堂先生长子。童年苦读，通经史，能诗文。清宣统元年（1909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天文物理系研读。毕业后应聘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19年应吴玉章之邀，回川任成都高等师范教授，后兼教务主任，在职期间，深为吴及以后历任校长所器重。1936年前后，任四川省教育厅代理厅长兼第一科科长。抗战期中回到德阳。1944年德阳成立县参议会被选为议长。解放后曾任德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及县政协副主席。

先生执教成都高师和师大（成都高师于1927年改为成都师大）凡十余年，培养四川各地中级教师及少数云、贵来学的共数千人，可说是：桃李遍巴蜀，教海及滇黔。

现就记忆所及举二三事以见一斑

一

1925年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害工人领袖顾正红，英巡捕枪杀游行群众，造成五·卅惨案，激起全国各地人民愤慨，纷起声援。成都华西中学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组织退学团，集体退学。当时成都只有六、七所中学，学生已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额，校舍、桌、凳等设备有限，不可能容纳大量退学学生。为了避免爱国学生失学，先生与高师毕业同学郑祖修等商议，创办一所中学接受华中退学学生。议定后成立董事会，公推先生为董事长，郑祖修为校长；取众志成城，抗御外侮之意，定名为成城公学（后改为成城中学）。仓卒之中一无所有，先生与郑祖修四方奔走，筹集经费，聘请教师，筹备用具，临时借用东马棚街外国语专科学校对面两个大院暂作校址。经两三月繁忙筹措，初具规模，学生众陆续入校，即宣布开学、上课。同时在旧皇城内修建校舍，增置设备，于翌年迁入新址。抗战期间为避空袭，又在外东铁门槛华荣寺后另建新校舍，规模及班次扩大颇多。经十余年苦心经营终使成城中学成为成都著名中学之一。

二

1927年腊月，我趁寒假回德阳看望祖母，1928年农历二月初八回到成都。到家后听说前两天三军联合办事处因省中打死校长事，枪毙师大、成大学生和师大附中主任袁诗尧等十四人，我感到很惊异。省中打死校长与师大、成大学生和附中主任有什么关系？我是省中二十班学生，1927年春毕业，离开省中仅仅一年，对省中情况比较了解。校长唐世芳、教务主任余沛华都为学生所爱戴。省中有两个学生组织：一个是石犀社（省中校址是古代石犀寺，当时尚有石刻犀牛一头，但已风化模糊，因此为名。）是由二十班同学石邦案、彭文伯等所组织，人数较多。另一个是石犀学会，由二十一班同学所组织，人数很少。石犀社倾向于共产主义，石犀学会倾向于国家主义，两个组织常有矛盾，唇枪舌剑，互不相

让。到成都的次日，我去先生家，向先生的姪儿郭益进（益进是省中二十三班同学，）了解情况。益进邀我到客房，在客房见到郭亚威和冉崇雁。郭亚威是先生本家侄孙，成城中学学生平时住校，假期中住先生家，我们常见。冉崇雁是省中二十三班同学，与我们班石邦案是酉阳同乡，也是石犀社成员，他与先生素不相识，虽和益进同班同学但无深交，他怎会在先生家呢？我很不解。当我问到省中事件时，冉告诉我：寒假中校长唐世芳辞职，同学们要求教务主任余沛华继任校长，而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的秘书，国家主义者，杨廷铨仗刘文辉权势，多方活动省中校长职位。同学们闻讯后推举两个代表到杨公馆，劝杨不要来省中任校长。杨说：任命校长自有政府，学生不能干预。几天后杨借了几个腰挂盒子枪的弁兵，簇拥他来到学校接校长任。陈竟思、冉崇雁……等四同学当即向他提出：同学们不欢迎他，请他离开。杨仗恃有军阀后台，有恃无恐。宣称他是政府任命的校长，有权管理学校，有权开除学生，彼此争执不下。他立即叫文书写布告开除陈、冉等四同学，并叫弁兵把四人赶出学校。此后几个弁兵整天护卫着杨时刻不离。杨见几天来平静无事，弁兵终究是借来的，别人另有任务，因此改为早送晚接，早上把他送到后就回去了。一天早上弁兵刚走，陈竟思、冉崇雁……等十多个同学就到了学校，进入校长室与杨理论，杨恃强骄横，由争执而互骂，而对打，人多手杂，几下就把杨打死了。同学把杨从校长室后窗拖出，丢在窗外井里，推倒井边一堵废墙把井盖了，然后离去，各奔东西。冉崇雁离家太远，两手空空，无处可投，才来找益进，说明情况要求暂避。益进转告先生，先生立即同意，留冉住下，并嘱益进以

“老表”相称，以避耳目。三军联合办事处于二月廿六日枪毙成大、师大同学和附中主任袁诗尧等十四人后，又七、八天布告通缉：陈竞思、冉崇雁、彭文伯……等，省中同学十一人。又过半个多月，事情逐渐冷了，成都市上茶坊酒店已无人再提此事，先生才安排冉离蓉，回酉阳去了。两个月后寄来一信，除致谢和问候外，说他又离家，骑马向东，走向他向往的地方。以后就没再得到他的信息。

省中事件发生后，军阀立即出动大批军队抓捕学生。在省中抓了几个家远留校，同时包围旧皇城抓捕师大、成大及附中主任袁诗尧等十五人。先生闻讯，当即多方奔走营救。由于前数月学生在街头讲演，揭露军阀们截留教育经费，影响学生学业，揭露他们私自设厂滥造五角银币，成色不足，扰乱金融。（当时四川军阀各自拥兵自卫，大肆搜刮，借口军费不足，截留教育经费，中饱私囊，致使各校行课每期最多不过十六周，最少只十周。军阀们私自设厂，滥造五角银币，降低成色，牟取暴利，酿成成都币制风潮，正如刘师亮的对联：“五角银元破、滥、哑，三个死人邓、田、刘。”）学生所揭露的事实俱在，无可辩驳，军阀们也只好怀恨在心，无可如何。省中事件发生后，他们有所借口，趁机报复、镇压，决心杀害被捕人员。先生虽然费尽心力也只保了个师大预科学生，十七岁的文星哲于不死；但仍被投入监狱，又经多方斡旋，才于三个多月后保释出狱。省中被捕的几个同学，由于他们确不知情，证据不实，几月后由夏斧私先生出面保释。

先生与吴老交谊深厚，与袁诗尧、张秀熟、陈守清等众多交往。陈守清是广汉人，原广汉县中校长。1930年广汉驻

军陈静珊部起义，是由广汉县中敲钟发出信号。由于没有群众基础缺乏支援，并以军阀们调动大批人马围、追、堵、截，起义终于失败。陈守清也不得不离家出走，经先生介绍到山东某地任教，到抗战前才回到四川。回川后在沐川工作一段时期，他爱人病死，回到广汉，任力生中学校长。

三

先生在德阳县参议会任议长期间，力持正义。1944年冬孝泉跃鲤中学教师刘以塘因在剧场看戏，被驻军一二六师彭团牟营士兵打伤。营长牟某反到跃中质问，骄横跋扈，言语中有再次指使士兵肇事之意。校长晏席如无法应付，进城向先生求援。先生问明情况亦颇不平。立即派人通知该团团长彭朋到县参议谈话。彭自已为是城防司令，官高权势大，并不把县参议会放在眼里，来到县参议会态度极为傲慢，先生见状仍以礼相待，然后在闲谈中略略提到在成都与刘葫浓（刘与邓锡候同学，曾任邓的参谋长，关系密切。）会见邓锡候（当时任二十八军军长，一二六师是其下属部队），邓颇谦和有礼。又谈到在贺良臣（一二六师师长，谢德堪的岳丈，贺与刘都是德阳人。）宴席上会见谢德堪，谢也颇有礼敬。最后才谈到孝泉的事。彭的态度立即改变，毕恭毕敬，只是推说：孝泉事情况不明，尚需调查。先生说：晏校长正在此间，不劳团长再去调查。即请晏相见。经晏把经过详情介绍后，彭表示十分遗憾。彭回团后即令张副团长偕同晏席如到孝泉。张到牟营传达团长指示后，即率全营官佐到跃中向刘以塘老师及全校师生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7——48年国民党特务在德阳横行无忌，势极猖獗。捣毁和平书店。深夜破门入室绑架卢尔庄，酷刑拷打。一些教师被跟踪。简师教师舒耀如常被跟踪。一天晚饭后我和蒋峻德在街头散步，也被跟踪。我家被大队警兵翻墙入室大肆搜查（当时我们都在城内，事后很久才听说）。先生对这些，尤其卢尔庄被绑架事，十分恼怒，一次在参议会当众痛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义正词严，幸县长龚万材从中劝解，才离去。

旧德阳地方势力概述

王朝华　曾南生

“五四”运动以后，结社、集会，应运而生。德阳先后则有“甲子学会”与“千秋学会”的出现。这两会中人多系中小学教师，余则是很少数的公职人员。

“甲子学会”系由省外专及省联中毕业同学田宇量、李述宣、石贡堂等人组成。该会以提倡新教育，全面开展德智体美群，启迪民智，发展教育为宗旨，以百年树人为大计。这些人是当时“教育救国论”的鼓吹者和信徒。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在街头巷尾钉立了格言牌（即今之所谓名人语录），上书“学贵有恒”，“有志者事竟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人语录。“千秋学会”成员是高等小学同事，或师范传习所的同学。由于彼此相处很好，每逢某人生日，大家便凑分子办酒席，为其庆寿，借此机会，欢聚一堂，开怀畅饮。由于“甲子学会”的出现，徐淦泉、杨佛安等人倡议，就将他们这种恭生，吃“转转会”的聚会，命名为“千秋学会”。其会员也是热心教育事业的人，但思想有些保守，对“五四”的新文化持否定态度。于是，他们与“甲子学会”各立门户，各行其是。虽各自主张不同，但大家都相处以礼，县人称两会中人都叫“学派”。后因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在关于设立四工科（音乐、体育、手工、图画）及购置风琴

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甲子学会”认为教育要注重全面发展，要重四工科，要购置风琴，而“千秋学会”则认为四工科可有可无，无须花钱购置风琴，因此争论不休。尤其在当时“僧多粥少”、“六腊战争”①激烈的情况下，两会都需安置关系户，因此促使两会对立加剧。但两会都未拉人入会扩充势力，仅各持门户之见，不作权益之争。两会中人，在教学方面都各有专长，如“田英语”、“李几何”、“徐数学”、“杨文学”，皆为邻近州县知名教师。他们与地方当局若接若离，抱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以表示其清高。他们不愿与官府往来，无意于地方势力的经营，故虽属地方派系，而未形成地方势力。那时，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兵进兵出，官来官去，派伕筹款，皆需为之应付，两会中人不善于此，故代之而起的“精益帮”便应运而生。

“精益帮”系以经营狮球牌纸烟及开设石印铺“精益社”为聚会之所而命名，是以郭世澄、谢元丝、曾寿嵩、高备卿等人形成的一个帮派组织，他们以县公安局长及商会委员名义，与驻军及官府打交道，为其筹款派伕，美其名曰“维护地方治安保护百姓，免遭官兵骚扰”。实则勾结官府，鱼肉百姓。本来明文规定，田赋税（过去谓之“上粮”）每年只征收一次，可是在那军阀时代，一年却要征收六、七次，且美其名曰：“预征”。德阳田赋税计八千余两，每两征收银洋十五元至十八元。以每两征收银洋十五元计，每年约收缴税银十二万元，这负担已经够重的了。而当时每年“预征”七次，则应收缴税八十四万元之多。那时，德阳人口约二十万，每人则应负担四元（约合稻谷一千四百余斤）。这只是正税的一种，若加上其他捐税，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

了。“精益帮”为军阀筹款，每百元得手续费二十元，这只是正额，加上其他回扣等那就更多了。由此可见，他们对军阀的横征暴敛不但不加抵制，反而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为军阀效劳，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样便引起了旅省部份同学的不满。当时，舒应和、蒋爵候、杨松屏、刘樊、钟澄泽等人，发起了对“精益帮”的谴责。认为“精益帮”腐败无能，助纣为虐，坑害百姓。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精益帮”的可耻勾当。传单内容生动，事实确凿，言辞恳切，文笔诙谐泼辣。内有“德阳‘三斋’（指商会委员肖寿斋，城厢联保主任黄宝斋等），‘八卿’（指筹款委员朱元卿、高备卿等）”给百姓带来“三灾”“八难”之语。特别是对教育局长谢元丝指责尤甚。有“教育局长盗卖学产，假公济私”等丑闻，读之令人捧腹。还有《王师长大造“馆娃宫”》，更是绘声绘色，将王荒淫无耻的私生活写得淋漓尽至，世人侧目。县人甚喜其文，争相传诵。民国十六年（1927年）大年正月初一，传单贴出，满城轰动，县人纷纷议论，致使驻军及“精益帮”狼狈不堪。县人称舒、蒋等人为“新学派”。故又有“新学派”与“精益帮”之争。但因“新学派系由旅省同乡会成员临时形成，在外读书或教书的居多，寒暑假回家相聚一起，坐坐茶铺，议论时局，发发牢骚，耍耍笔杆子，指责当局，骂骂“精益帮”，为老百姓出口气而已。并不想搞垮“精益帮”取而代之，故雨过云散，为时不久，德阳仍是死水一潭。何况当时正是“红帽子”满天飞的时代，稍有不慎即遭陷害。如杨松屏因言语过激，遂被驻军诬为“共党分子”而身陷囹圄。幸杨与前四川都督尹昌衡是至亲，由尹保释出狱。但杨之产业几乎丧尽，致使杨所经营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